

陆先生

文/宋玉麟



陆俨少先生为宋玉麟示范(宋玉麟供图)

记得小时候,父亲在离家三里地之外的上海安亭师范任教,由于父亲住校,平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很难见到他。到了星期天,我经常问母亲,父亲怎么休息天也不回家?母亲就会淡淡地告诉我,你父亲看陆先生去了。时间一长,陆先生这三个字慢慢地就印在我幼小的脑海里,却又是那么地朦胧和遥远……

1961年我从家乡来到南京,随父亲一起生活。当时江苏省国画院已从湖南路搬到“总统府”的西花园,画院的宿舍也就在“总统府”东侧的几排平房。在父亲的身边,我身上的艺术细胞突然被激活了,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当时画院第一期学员班的教室就在“总统府”大院左侧的厢房内,平时只要一有机会,我便会在学员的画桌上,凭兴趣涂抹。一天晚上,父亲去教室巡视,看到我正在临摹他的一幅山水,他有些吃惊,看了一会儿,他笑笑对我说:“不要临摹我的,要学陆俨少先生的,我来找一些陆先生的画给你临摹。”在父亲的眼里,学陆俨少的画就是学传统,所以在父亲的指点下,我学习绘画的第一课就是从陆先生开始的,从此我知道了,当年母亲所讲的“陆先生”就是陆俨少先生。今天看来这“第一口奶”无疑对我今后艺术上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1965年我顺利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学习。当时报考

该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,就是可以在上海可以随陆俨少先生学画,对此,父亲也非常赞成。就在我去上海考试的期间,父亲还专程领我去陆俨少先生家。陆先生寓所在上海复兴中路一老式石库门房子的底层,一排窗户均朝东,仅有一间不到20平米的屋子以布帘一隔为二,老少三代人共居,十分拥挤。靠窗摆着一张红木小画桌,既是先生作画的地方,也是全家人吃饭的饭桌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陆俨少先生,先生给我的印象便是慈祥、宽厚、平易近人。伯母待我也如己出,十分热情。父亲当面拜托陆先生说,如果玉麟能录取到上海学习,届时麻烦您教玉麟画画。陆俨少先生一口答应。听到陆先生答应教我画画,我内心真有说不出的开心。

入学以后,我几年每个星期天都会到陆先生家去讨教,我每次都会把我临他画的作业交先生批改,好在我临先生的画已有多,有一定的基础,所以先生比较满意,有时也会动笔,一边讲解,一边帮我改画。先生也经常借画给我回学校临摹。我每次去先生家更多的是看他画画或者是在旁边聆听他和友人聊天,都是受益匪浅。这样的状况,前后持续将近8年,直到1972年12月我离开上海毕业分配回南京工作为止。一晃50年过去了,时过境迁,物是人非,回想起这段追随陆俨少先生学习的经历,真是令人怀念。■

因为错误,青春才有别样之美

文/李辉

难得清静,拿出白纸的小说《请别把我在路上叫醒》闲读。错误一、错误二、错误三……白纸以连续“六个错”作为小说主要章节,串起一个少年从初中到高中的青春经历。他在封面上写了这样一段话:

在青春的这条高速公路上,我情愿一错再错。哪怕被罪与罚魔住,也不要被半路叫醒。

常说青春是美丽的,殊不知,这并非全然由正确构成,恰恰是一个又一个错误。这是白纸正是以一个少年的桀骜不驯,告诉我们错误与青春的必然关联。

看着白纸长大,每一次见面,他的话题为我们这些父辈,打开了了解少年世界的窗口。日本漫画、动画片、武侠小说如数家珍;对英超曼城以及阿根廷队一往情深;热衷摇滚与足球……

闲读此书,自己的中学时光,不时会蹦出来,与小说中的场景重叠。看似重叠,其实是两个迥然相异的年代。遥想四十多年前,我们的中学生活,男女同学几乎都遵守清规戒律,很少个别交往。记得在初中,另一班的女同学,我与之并不熟悉,她给我写了一封信,偷偷放进我课桌。她哪里知道,一天前我刚换过座位。

结果,她的信被发现,某男同学将之公开,我顿时成为班上的笑柄。有了此事,再与那位女同学见面,只好低头,好像自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。

荒唐年代,另外一种不一样的青春,一种今天的中学生难以理解的青春。

白纸笔下的中学生,个性鲜明,其生命充满勃勃生机。他们的世界,我们不熟悉,却值得了解。

欣赏他的驾驭能力。场景闪回不定,叙述从容不迫。小说重点渲染的,并不是男女同学之间的恋情,而是试图解读少年们的青春时期,是否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情感:“在爱情与友情之外,还有没有另一种情感?如何界定‘男朋友’还是‘男闺蜜’?这问题,让我为之困扰多年……”正是因这困扰,才使他对林开与蓝紫青关系的层层推进和细细解剖,成为这部作品最具力度的表现。进而为青春小说增加了新的内涵。

走进大学半年之后,林开与凝霜相爱,有这样一场对话:

“刚才你头发上有一些小雪花,不融化,还真是和你的名字很像呢。”

她和我并肩而立。她的头顶大概到我的下巴,这正是合适的身高

差。她没有看我,这也给了我调整的空间与深呼吸的机会。

她轻轻地说:“但是这些雪花可比我好看了。”

“可我觉得你要美上许多啊。”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气氛是“不经意”,所以我只好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了。

多年之前,我也曾经历过相似的情形,但那时站在我面前的女孩,如今我已记不得了。

本应是浪漫场景的叙述,白纸却显得如此冷静,穿插进来的一段文字结束于“如今我已记不得了”,透出一种冷幽默。

的确,白纸的创作愿望不限于青春文学。他说过,自己读过的最震撼的小说是《一九八四》,他还渴望能够成为奥威尔一样的人物。第一部小说的写作,让人看到了他具备的潜力。他用不一样的眼睛审视生存的时代,窥探属于自己可以冷峻表达的主题。对于他,能否成为奥威尔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如何面对正在向他走来的一个不可知的时代,如何像奥威尔那样用文学为现实立此存照。

因为错误,青春才美丽。

不过,错误与历史的关系却不然。也许白纸已经开始明白了这一点。■



山水人家 摄影/刘群

“新古迹”被打得满头包

文/朱辉

在这个社会批评如箭矢般漫天飞舞的时代,仿古建筑一直是箭垛子。丑陋、臆造,质量低劣,这些言辞常常是批评者的集束手雷。而靡费公帑,僭越规格,则是更具道德高度的空对地导弹。此类批评义正辞严,颇为强横,言之一出,常常众口诺诺。这类言论身着厉行节约、关注民生、珍视古迹的衣裳,又确实怀揣一颗对公共事务的热心肠,几乎天生是不容置辩的金刚之身;如果他们抨击的目标是那些拆去真古迹,代之以假古迹的恶劣行为,则更具泰山压顶般的舆论压力了——把仿古建筑名之为“新古迹”,本身就是个精致的嘲讽,一种批评策略。

但是对于所谓“新古迹”,我们真的不可一概而论。射箭是容易的,找到该死的目标就比较难。如前所述,“新古迹”至少应该分成三类,修复,重建(原地或易地),完全新建。修复似乎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,“修旧如旧”已是共识,不再赘言;重建则常常引来众口汹汹;而完全新建的,因为少有模板,是当代人的设计,几乎必定招来滔滔口水。但这些

汹汹的声音一定是持正理性的吗?滔滔口水一定是健康的吗?显然不见得。虽然拆去真古迹,建假古迹取而代之无疑可恶,要么是智商堪忧,要么是居心可疑,但对另一些所谓“假古迹”、“新古迹”,我们怕是缺少了一点包容之心,欣赏之情。

无锡的灵山。新建的“梵宫”庞大、巍峨,甚至奢靡。工程之浩大一望可知,细微处处处用心。它是智慧和手艺的集成,当然也是钱堆起来的。这些钱想必数额巨大,其来源我虽不甚清楚,但其中很多来自于善男信女也有勒石为证。此类建筑因为对古老宗教的传承和对经典佛教建筑的某种沿袭,也可归入“新古迹”之列。然而它的价值其实是显而易见的:它是宗教信众的云集之地,也是当代建筑艺术的集中展示。它现在是新建筑,可多少年多少代之后,难道不就是真正的古迹么?

所有的古迹原本都是新建的。倘若我们的古人也一味忌惮于悠悠之口,现今遍布华夏的古迹从何而来?我们的文化又向何处附丽?

重修圆明园确乎应该慎之又

慎,但似也不必一味嘲笑斥骂。故宫的太和殿建于明永乐十八年(1420年),称奉天殿。明嘉靖四十一年(1562年)改称皇极殿,清顺治二年(1645年)改今名。建成后屡遭焚毁,多次重建,现在看到的是康熙三十四年(1695年)重建后的形制。假如永乐帝不建,此后烧毁了也不重建,故宫还是今天这个辉煌完整的皇家宫殿吗?

道理其实是清楚的,但实际情况确实要复杂一些。前面说到圆明园,是否重建确有可议之处;时机不成熟,是一个暂时搁置争议的好办法。不过有时候情况并不都如这般复杂缠夹。对古迹的修复、重建,甚至完全新建仿古建筑,并不一定就是大逆不道的土豪之举。功能显著,就是说确有使用或观赏需要,且财政可敷,就应该建;尊重古意,融合创新,精心设计,就可以造出好建筑,它们将是未来的古迹;而要成为未来的古迹,它要经得起时光和风雨的冲刷淘洗,它的质量必须是过硬的。可见,功能、美感和质量,才应该是我们建言立议监督的焦点。■



稼轩词意《梅花》画作 陆俨少